

语文小丛书

文学与社会生活

李传龙

北京出版社

文学研究所

语文小丛书

文学与社会生活

李傳龙

北京出版社

1964年

《語文小丛书》編輯委员会

主 編 吳 晗

副主編 王 力 陈哲文

編 委 朱德熙 朱 寨 冰 心 巩廓如 呂叔湘
严家炎 張志公 李菊田 吳伯蕭 吳組緝
吳曉鈴 周 平 周 游 陈貽焮 陆宗达
馬学良 唐 弢 郭預衡 脩古藩 馮 至
馮其庸 馮钟芸 廖沫沙 廖仲安 黎錦熙
潘逊皋 蕭 璋

(以姓名笔划为序)

助 編 北京教师进修学院

語文小丛书〔9〕 文学与社会生活

李 傳 龙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张：1 14/16·字数：28,000

1964年5月第1版 196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3,500册

统一书号：10071·712 定价：（6）0.14元

本书根据毛泽东文艺思想，結合文学作品和作家的創作經驗，簡要地闡述了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說明了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家必須通过生活和斗争实践，去吸取創作源泉。书中还用实例叙述了形象的特点、新的英雄人物的創造，以及文学的認識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的文艺理論；还着重談到作家只有深入工农兵群众，做一个革命的文艺战士，才能創造出为群众所需要、所喜爱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来。

目 录

一	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	1
二	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	15
三	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作用·····	31
四	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创造社会主义 文学·····	45

一 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

当我们讀赵树理的《三里灣》的时候,就像来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的三里灣。我們感受到三里灣合作社秋收丰产的景象,接触到这个村里各色各样的人物。我們看見王金生忙于计划和組織扩社、开渠等工作,领导群众向資本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王玉生为了开渠积极改装水車,試制土起重機;范灵芝一心一意要給她爹“治病”,主动揭发她爹走資本主义道路的思想 和行为。我們也看見范登高雇工,做买卖,走資本主义道路;馬多寿剝削互助組的劳力,阻撓三里灣的扩社运动;袁天成受老婆的摆布,身在合作社,心在自留地,等等。总之,我們在这部作品中所看到的一切,和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农村生活一样有声有色,丰富多采。因此我們說《三里灣》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农村社会生活的反映。

其实,不只是《三里灣》才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其它一切描写人物和事件的作品,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

会生活是客观存在的，它总是由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组成的，文学作品如果描写了人物和事件，实际上就是从某一方面再现了社会生活，也就是从某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文学发展的历史向我们表明，任何描写人物和事件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反映。草明的《乘风破浪》通过刘进春、李少祥、宋紫峰等人物的创造，通过某钢铁联合企业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中的生产劳动和思想斗争的描写，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业战线上的斗争生活。曲波的《林海雪原》所描写的小分队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以及消灭马希山、侯殿坤股匪等情节，正是解放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的战斗生活的反映。

描写人物和事件的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并不限于描写人物和事件，它除了描写人物和事件以外，还可以描写自然界。因为人的社会生活不能离开自然界，社会生活中的人对自然界总有种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关系，所以有些文学作品要想从多方面来反映社会生活，就不能不描写自然界的现象。鲁迅的《故乡》是一篇反映旧社会农村生活的作品，但是作品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自然风景的图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点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这是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也可以說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因为作者通过这幅凄凉萧瑟的景象，烘托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村經濟破产的景况，以及当时农民的苦难生活。

有些文学作品，不只是描写了自然現象，甚至把自然現象作为自己描写的主要对象。某些专门描写自然景物的詩歌和散文就是如此。这类作品能不能說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呢？我們說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类作品反映社会生活有两种主要情况。一种情况是在描写自然現象的过程中，抓住自然景物的时代特色，以时代的色彩来描繪它，渲染它，使它体现时代的精神，反映时代的風貌。例如梁上泉的《彩色的河流》：“百里山谷，百里河水，百里綠竹，百里紅梅，百里蜜桃百里橘，一层更比一层美。”这首詩沒有直接描写人物和事件，写的是祖国边疆的自然景物。作者抓住了自然景物的时代特色，写出了一幅在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所美化的景色，通过这些景色描繪，表现了我們时代所特

有的景物美，反映了祖国边疆社会主义建設的新風貌。再一种情况是在描写自然現象的过程中，把自然現象人格化，使它象征和体现某种人的精神面貌，从而反映社会生活。茅盾的散文《白楊礼贊》就是如此。这篇作品也不是直接描写社会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而主要的是描写白楊树。作者写白楊树如何美，如何不平凡，如何具有力爭上游的精神，并且写出了它的性格：偉岸、正直、朴质、严肃、温和、坚强、挺拔。这篇作品虽然是描写白楊树，但却有着鮮明的时代色彩和生活气息。作品写于抗日战争时期，作者通过白楊树的雄偉的姿态和崇高的性格的描写，贊美了共产党、八路軍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斗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作者笔下的白楊树象征了中国共产党和英雄的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偉大風格，体现了我們民族解放斗争期間的时代精神。由此可見，以自然現象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归根到底还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既然描写人物、事件的作品和描写自然現象的作品，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那么这些作品就不能离开自己所反映的生活对象，也就是說它們必須来源于社会生活，必須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才能产生。《乘風破浪》不能脱离自己的时代背景，它只有在我国社会

主义时代工人阶级战斗生活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白楊礼贊》的产生当然和作者对白楊树的感受分不开,但是它主要还是根据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創造出来的。

不过有人要問:有些文学作品,不是直接描写人物和事件,也不是直接描写自然現象,而是主要抒发作者的感情,或表現作者的幻想,这能不能說它們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来源于社会生活呢?

我們就先談談以抒发作者感情为主的作品。在阶级社会中,作者所抒发的感情,总是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一种精神生活,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因此以抒发作者感情为主的作品,也不外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作者的感情要由客观事物的激发才能产生,总有它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因此以抒发作者感情为主的作品,也必须来源于社会生活。例如大家所熟悉的一首歌謠《海水磨墨写不赢》:

毛主席来恩情深,
万首山歌唱不尽。
树林当笔天当紙,
海水磨墨写不赢。

这首歌謠通过对毛主席的歌頌,真实地反映了 我

們的偉大領袖和人民群眾之間的真摯、崇高的情誼：一方面毛主席熱愛人民，給人民帶來了真正的幸福生活，對人民有着無限的恩情；另一方面人民擁護毛主席，感謝毛主席，對毛主席無比地敬愛。你看，這首抒情詩具有多么強烈的時代精神！如果作者不生在我們偉大的時代，對我們領袖的恩情沒有深切的感受，要想寫出這樣情真意深的動人詩篇，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們再來談談表現作者幻想的文學作品。幻想作為人的一種精神活動，是在一定的社會生活的基礎上產生的，也是對社會生活的一種曲折的反映。因此表現作者幻想的作品，往往總是通過曲折變幻的形式反映社會生活，同時又必須以社會生活為基礎。吳承恩的《西游記》，就是一部用幻想構成的神話小說。這部小說通過“大鬧天宮”等富於變幻的神話故事，曲折地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人民和統治階級的矛盾，間接地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反抗和鬥爭。在“大鬧天宮”的故事中，孫悟空豎起了“齊天大聖”的旗幟，提出了“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號，並且打敗了天兵天將，動搖了天宮的統治。這些富於變幻的情節，就是以封建社會中英勇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為基礎的。如果沒有歷史上歷次英勇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情節就不可能產生。魯迅說得好：“天才們無

論怎樣說大話，歸根結蒂，還是不能凭空創造。描神畫鬼，毫無對証，本可以專靠了神思，所謂‘天馬行空’似的揮寫了，然而他們寫出來的，也不過是三只眼，長頸子，就是在常見的人體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長了頸子二三尺而已。”^① 這說明富于幻想的神話形式的文學作品，也不能凭空創造，也必須以社會生活為基礎。

上面說明，一切文學作品，不管是描寫人物和事件的也好，描寫自然現象的也好，抒發作者感情的也好，還是表現作者幻想的也好，歸根到底，都是社會生活的反映，都是來源於社會生活。所以，毛主席指出：社會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為只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②

在文學的源泉問題上，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理論家 and 我們的看法是針鋒相對的。他們從資產階級利益出發，害怕文學暴露舊社會的黑暗和反動統治階級的丑惡本質，也害怕文學反映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因此極力否認社會生活是文學的源泉，認為文學的源泉是作家的主觀精神。反革命分子胡風就是這種主觀唯心主義

① 《葉紫作〈丰收〉序》，《魯迅全集》第六卷175頁。

②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62頁。

最猖狂的宣傳者。胡風提出，“主觀戰鬥精神”是文學創作的源泉。在他看來，作家根本不需要生活，只要進行“自我擴張”、“自我鬥爭”，把“精神力量”燃燒起來，就能創造出成功的作品。胡風鼓吹這種反動論調，其目的就在於要使作家脫離生活，脫離革命鬥爭，以便文學為反動的政治服務。

在這一問題上，還有的人把過去的文學作品看作是文學的源泉。認為不管有沒有生活，只要努力向前人的優秀作品學習，就能寫出好的作品來。這種看法也是錯誤的。從事創作，固然要從前人的作品中吸取創作經驗，提高寫作能力，但是僅僅依靠過去的作品是不夠的，因為過去的作品並不是創作的源泉。正如毛主席所指出：“過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出來的東西。”^①如果離開了社會生活這一文學創作的源泉，專門依靠前人的作品，要想創造出真正好的作品來，是絕對不可能的。

社會生活是文學創作的唯一源泉，這是文學創作的基礎規律。創作實踐的經驗向我們表明，任何著名作家之所以能創造出真正的好作品，首先就是因為有

① 《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62頁。

被反映的社会生活存在,因为他们深入生活,参加社会实践,从而获得了社会生活这一文学创作的源泉。

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他之所以能创造出这部伟大的作品,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生活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体验到了没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熟悉封建贵族各色各样的人物。他在《红楼梦》第一回通过石头的口气告诉我们:这部作品的内容是“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这就是说,《红楼梦》这部作品,就是以作者半世的生活经验为基础,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所创造出来的。

任何作家都要通过生活实践去吸取文学创作的源泉。但是在阶级社会里,作家生活实践的方式总是由他所属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作家,总是通过不同的生活实践去吸取文学创作的源泉。很明显;我们今天的革命作家就不能重复曹雪芹的生活实践方式去吸取创作源泉。那么今天的革命作家要通过怎样的生活实践的方式去吸取创作源泉呢?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作了最科学的回答: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須到群众中去,必須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①

毛主席在这里明确地指出,革命作家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才能获得文学创作的源泉。当然,毛主席要作家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不只是为了作家吸取创作源泉,还为了作家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为什么革命作家一定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吸取文学创作的源泉呢?这是由革命文学的任务所决定的。革命文学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它必须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鼓舞群众、教育群众、帮助群众推动现实的发展。革命作家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就应该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在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62页。

今天，特別應該反映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在社会主义时代，我們有三項偉大的革命运动，即階級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革命文学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就应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偉大成就，表现人民群众建设祖国的丰功伟绩，描绘人民群众同自然界作斗争的高尚品质，尤其应该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階級斗争，表现階級斗争中人民群众新的思想品质的成长。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階級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文学只有正确地充分地描写了这个階級斗争，才能更真实地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社会本质。同时，階級斗争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而文学是階級斗争的有力武器。革命作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階級观点和階級斗争的观点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真实有力地反映新时代的階級斗争，鼓舞和教育人民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武装自己，朝着正确的革命方向奋勇前进。正是由于以上的任务，所以革命作家就不能坐在书斋里与社会生活隔绝，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

和了解工农兵，深切地感受和正确地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使自己的作品真实有力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事实证明，任何革命作家，只有当他深入工农兵，深入实际斗争，获得了文学创作的源泉，才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革命文学作品。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是两部为群众所喜爱而且在群众中影响很好的小说。前者成功地反映了我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深刻有力地表现了在党领导下的广大农民推翻封建统治的剧烈斗争。后者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农村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深刻地描写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力地表现了农村生活和人们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鲜明地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这两部作品写得这么成功，当然有不少原因，但是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作者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工农兵，深入火热的斗争，从而深刻地感受到了和正确地理解到了：土地改革运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的意义。正如作者自己所說：“自从一九四二年，毛澤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党的文艺方针确定了。什么是创作的源泉，大家都明白了。我和许多作家一样，遵循了毛澤东同志的